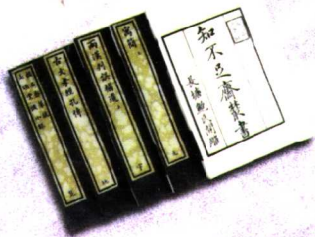


中国名人
读书生涯



梁启超

王心裁 / 著

读书生涯

時務學堂故址

二十六年
前清學堂
民國
八年
重修
梁啟超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梁白超

讀書生涯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中国名人
读书生涯



* T 0 2 2 4 5 9 *

梁启超

王心敬 / 著

读书生涯



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十月
一月生
梁启超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读书生涯/王心裁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王余光主编)

ISBN 7-5354-1626-8

I. 梁… II. 王… III. 梁启超-生平事迹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0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秦文仲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邯郸新华印刷厂

(电话:5837121)

邮编:056002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1.125

版 次:2000 年 6 月修订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26-8/K·48

定价: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梁啟超為時務學堂題箋



梁啟超像

AC2475.02



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



梁启超和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

殿風來冷香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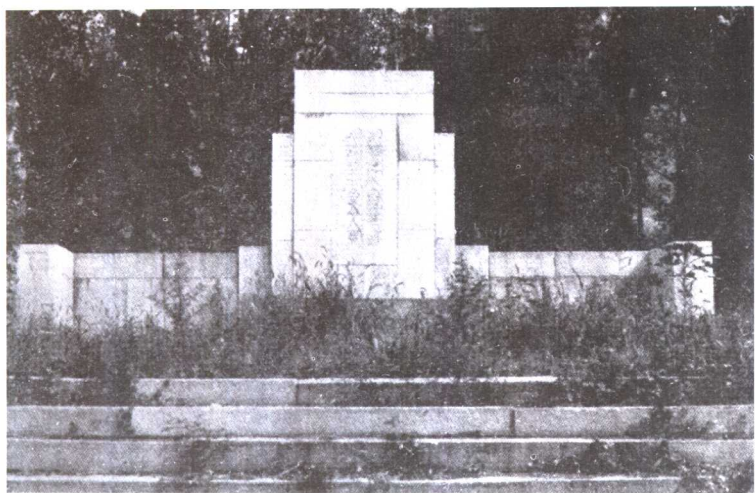
夢魂欲
月墮
甲午十一月

數年前重刊。則日後取筆。中論上卷。亦題陳叔。甲午四月。啓德。

梁启超手迹



梁启超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梁启超及其夫人李蕙仙之墓

序

许多人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读书的民族。是这样的，古代一位诗人曾写道：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读书，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乐趣的组成部分。

时代进入鸦片战争以后，古代那田园诗般的读书生活已悄然改变，救亡与启蒙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些国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也开始反省传统的知识结构，倡言西学。1898年，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融合中，思想、文化形态发生了空前的大震荡，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作家、学者，对西方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革，对中国的前途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然而直至今日，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了解和认识这些先哲们的读书与治学生涯，对深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继承与扬弃、批判与吸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等一系列问题，就不无借鉴与启迪了。

当我们重温近百年间这些先哲们的读书生活时，深切地感受到，读书风气的酿成与知识的增长，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

素质的提高。记得在 1994 年,俄国一家权威杂志,就“读书在荧屏时代的命运”这一问题,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俄罗斯鲁巴金阅读基金会主席普洛特尼科夫教授认为:人们电视看多了,会使注意力分散,思维没有系统,对世界的理解支离破碎,想象力水平大大降低。人们变得匆匆忙忙,他们感到言语表达困难,在谈话中突然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缺少积极的词汇、机智等。读书时间的减少和看电视时间的增多,并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短短十几年的功夫,电视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千家万户,与寻常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个有几千年读书和藏书传统的国度里,藏书家庭日渐稀少。昔日夫子们宁静的书斋,今日被子孙们改造成轰鸣的卡拉 OK 房。有鉴于此,五年前我与徐雁先生联袂主编了一本《中国读书大辞典》,在这本辞典的序言中,徐雁写道:时值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狂飙突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电视、影像等各种大众传媒的普及,使民族独特的文化积累和个体独特的创造能力越来越走向窘迫。写字、读书、作文的传统求知方式被不断弱化,古典的读书精神几被扫荡无遗。在今天,倡言读书,鼓励求知,已经越来越成为寂寞而困难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这个肩负着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古老民族,读书人口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些。这是一个文明古国无可名状的莫大悲哀。今天,在这套“读书生涯”丛书即将奉献给读者之际,我想,它对我们继承优良的读书传统和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亦将有所裨益,这也正是作者和出版者的愿望之所在。

王余光

1997 年 8 月 1 日

卷 首 语

梁启超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即以“流质易变”相责，梁启超自己亦颇自知，曾多次描述总结自己的变化，如《三十自述》即记载了他青少年时治帖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

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而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这三次变化分别发生在他一生中的三个不同时期，即戊戌政变前的国内生活时期，日本流亡时期，和民国时期，这三个时期加起来就是他一生的全部。

应该说拜师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变化，至少，是康有为使他懂得了什么叫做“学”。此之所谓“学”不是训诂之学，因为训诂小道，乃术，靠训诂绝不能获得康有为所谓的“微言大义”；也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那种学，梁启超后来下过定义，即“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①而是人格养成的性命之学，是从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如此之

^① 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版，第12页。

类,是梁启超囿于汉学天地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康有为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令他“尽失其故垒”,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且有惊喜交集、怨艾无端、疑惧莫明之感,以致于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而第二天,康有为所指点与他的,是陆王心学,并史学西学之梗概。^①

这次变化颇有些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刚获取举人的功名不久,且已摆脱为功名利禄而死记硬背的帖括之学之途,正在汉学领域内恣游,踌躇满志,如果不是因偶然的会在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结识与自己年龄相若的陈千秋,如果陈千秋不是已先见到康有为,并为其学所震撼,那么,梁启超就会在正常的学优而仕或学优而学之途上做个庸常的官吏或平凡的学者,是康有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教,是康有为以国家、种族、孔教的存亡相激励,才使得他将自己与一个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

拜师康有为对梁启超来说有幸有不幸。幸的是一条小河流入了大海,发现了一个广袤的新领域;不幸的是小河从此失去了自己。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听的是康有为的课,读的是康有为的书,学的是康有为的学问,说的是康有为说过的话,连一举一动,都依康有为制订的礼节行事。教书东莞,编《读书分月课程》,乃康有为嘱其据《桂学答问》“抽绎”而成;任教长沙时务学堂,标举的旗帜是康有为推崇的陆王派修养论及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②编报作文,则曰:“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③

① 《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③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0页。

所幸的是梁启超学问欲极炽,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因与康有为空间上的距离,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种分歧,在学术上,是“不嫌于其师之武断”,三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也不怎么谈改制;^①在保皇还是革命上,是革义时时出入胸中,并与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多所接触;在对待西学上,是身体力行,尽力输入西方科学文化。

正当这种分歧越来越突出之时,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美,在十个月的时间里,他对美国社会及在美华人等问题作了详细考察,这次考察导致了他思想上的一次巨大变化。游美之前,他大力介绍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不遗余力译介西方科学文化,在他看来,输入外国学术能使本国学术得到发扬光大,因为“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二十世纪是泰西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婚之时代”,他说:“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迎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②

但是,他之鼓吹民权自由革命,受到了康有为的批驳和斥责,黄遵宪也在信中表达了与康有为相近的看法,说:“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③师友的看法虽不足以改变其观点,但显然引起了他内心进取性与保守性的交战。

游历美洲,又使梁启超发现了共和制度的不少不足之处,更

① 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1—63页。

②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第4页。

③ 东海公(即黄遵宪)来函,《新民丛报》第13号第55页。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0页。

重要的是,他考察了在美华人,感到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习惯受专制而不习惯享自由,且无高尚之目的。^①这一考察结果隐含了这样一种推理,即:既然在共和制度生活之下的华人甚且只是如此,那么,转介共和等思想于国人会有什么用呢?

所以回到日本他即撰文说:“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形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②在梁启超看来,国民不仅公德有待塑造,即私德亦同样不修,也就是说,国民素质太差。民德未备,民智未开,革命也就不宜提倡,共和也就当与之长别。^③既然“新道德之输入,因此遂绝望”,那么,用什么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呢?梁启超以为,只有“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④

这是梁启超一生中经历的第二次重大变化。这次变化,导致他游美以后言论大变。他在一种极矛盾的心理中经历了这次变

① 《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第121—125页;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9页。

② 《新民说·论私德》,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27—128页。

③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86页。

④ 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32页。

化,他现在所否定的,是他所一度提倡的,他现在所提倡的,又是他一度所否定的。但中国之旧学既然简单而不适应于形势,中国之旧道德就能维系社会于一线么?他显然缺乏此自信,以致以后一段时间里“意态萧索”,^①虽然其萧索主要因死战革命党失败、政闻社被禁等事所直接引起,但对中国文化缺乏信心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的重大原因。

流亡日本时期是梁启超一生思想变动巨大同时又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流亡之初,上承时务学堂期的思想,革义出入胸中,办《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②随后有鉴于革命可能造成灾难后果,而主张政治革命或不流血的破坏,乃至深信共和制不适宜于中国而主张开明专制。当清政府下预备立宪之诏(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又鼓吹君主立宪。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随时都在更改,这大概是他被责为“流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从革命到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梁启超并非见风使舵,搞政治投机,他的变化乃是以他对国家(而不仅仅是清政府、清皇室)的稳定与发展的思考为前提条件。这样一种思考也使他很快就承认了中华民国的成立这样一个现实。

梁启超一直希望国家秩序稳定,从而组织强而优良的政府,以与其他各国争胜。民国的成立使他感到一种希望,所以他于1912年10月回国,随后并开始了其组织政党政治的尝试。而且共和制度既已建立,他断不容许复辟与倒退,所以反袁护国,他是最耀眼的明星,反张勋二次复辟,他同样为众目所注。

但是,虽然政治上他能适应形势而作出变化,文化上他却仍

①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3页。

②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

处在一种自卑之中,这种自卑情绪直到一战后他游历欧洲,才一扫而光。

他是在1918年12月28日出发游历欧洲的,至1920年3月5日返抵上海,历时一年多。欧游归来后,他在中国公学演讲,说:“此次游欧,……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①

事实上早在欧游方四月余时他即感受到了他内心所起的变化,在给其弟梁启勋的信中说:“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②

他之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与他在巴黎时同柏格森之师蒲陀罗(Boutreu)的一席谈话有相当的关系,蒲陀罗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它,而且叫它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它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这使梁启超茅塞顿开,既然是很浅薄的文明,只要发挥出来就都是好的,更何况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梁启超因此深觉“对不起祖宗”,因为“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曾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③

在欧洲,大战使人们对科学万能说产生了失望,梁启超认为,用科学只能发展起物质文明,但却难以发展精神文明,尤其

①②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0、881页。

③ 《欧游心影录节录》,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5—37页。